



桑兵 著

庚子勤王与
晚清政局



北京大学出版社

桑兵 著

庚子勤王与
晚清政局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桑兵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
ISBN 7-301-07079-9

I. 庚… II. 桑… III. 历史事件—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K25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740 号

书 名: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著作责任者: 桑兵 著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079-9/K·033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30.75印张 443千字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7.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	
——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	22
第一节 救上	23
第二节 归政	29
第三节 立储	38
第四节 保皇	43
第五节 勤王	50
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	64
第一节 重在两广	64
第二节 东西无常	71
第三节 秀才用兵	80
第四节 聪明反被聪明误	86
第三章 中国议会	106
第一节 组织与人员	107
第二节 正气会	110
第三节 汪、唐之争	115
第四节 自立会	121
第五节 康有为的阴影	127
第六节 各方关系	130
第七节 国民发动	137
第四章 兴汉会	155
第一节 缘起	155

2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第二节	维新派介入	160
第三节	意外之果	164
第四节	天平倾斜	167
第五节	影响犹存	171
第五章	革命党	182
第一节	自立军与革政派	182
第二节	兴中会与维新派	187
第三节	江岛人物	194
第四节	应和与分争	199
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	213
第一节	不约而同	213
第二节	使节与异人	217
第三节	民为邦本	227
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	238
第一节	邱、林、徐、黄、力	238
第二节	捐款与定策	244
第三节	因嫌生隙	249
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	261
第一节	护驾潜因	261
第二节	戴后与助帝	264
第三节	互为奥援	268
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	281
第一节	盗与官绅	282
第二节	盗任官责	287
第三节	勤王军将	290
第四节	死而不靖	295
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	304
第一节	组织	304
第二节	事业	306
第三节	镜湖茶谈社	310
第四节	参与革命	315
第五节	内外分歧	317

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	327
第一节	复仇复辟	327
第二节	勤王辅助	329
第三节	再向京师	335
第四节	渐入下流	340
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	350
第一节	变法与自主	351
第二节	复辟与革命	354
第三节	勤王与民政	361
第四节	讨满与保皇	365
第五节	余波回澜	375
第六节	种豆得豆	382
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	396
第一节	港澳二何	397
第二节	港澳总局	404
第三节	内外关系	408
第四节	商务公司	417
第五节	港澳与滨沪	427
第六节	保皇大会	440
第七节	难得善终	449
征引文献		473

绪 论

一

人生有缘。生长于人杰地灵、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偶然机会，到过雁山公园。在风景如画的环境里建造园林，胜意处自然只能求诸山水之外。当时羡慕的是园中一株既高且大的相思古树，据说十分名贵，后来才知道那座园本是晚清名臣、民国元老岑春煊的一处私宅。几十年过去，园主已然成为游园少年研究的对象。

1993年在日本访问研究期间，曾由久保田文次教授引导游览镰仓江之岛，霞光水色，景色绮丽，令人胸襟一阔，特意请十分熟悉近代中国人在日本活动史事遗迹的久保田教授指路，来到岛上的金龟楼前流连片刻。1899年7月，梁启超等12人结义于此，有心反清，并与乃师康有为立异。光阴似箭，百年将过，人去楼非，只有楼名依旧。斜阳之下，令人顿生几分苍凉，无限感慨。这两件事，或无心，或有意，由一缘字连接，百年时空，刹那接近。

研治庚子勤王史事，开始可谓误打误撞。本来师友相邀，分工合作，撰写一部较为详尽的孙中山传记。因为前此参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分得1895至1905年部分，这一段自然归我起稿。用数月之功，得10万余字，将乙未至庚子一节草就。但渐渐发觉，比照新出材料，既有思路破绽百出，难以弥缝，于是抛开原稿，不循旧路，重新由解读材料入手，以去心中疑惑。因为有了前段的教训，对于新旧材料的区别以及旧说与历史本相的差异，感觉格外敏锐。通过比勘参证各类新旧材料，相关人事及其复杂关系逐渐清晰，历史本相的脉络轮廓日益显现。当时隐隐察觉揪住一桩历史大案，剥茧抽丝，可以发覆。不曾想仍须再用

十余年苦功,才能大体作一收束,并且不少问题还须留有以待。治史之难,局外人何尝能够体会万一,其中的艰辛与乐趣,何足为外人道哉。

二

治史首要,在于史料与问题的配合恰如其分。就史料而言,应恰当把握新旧材料的关系。近代学人多偏于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一味重视发现新材料,而置基本史书、史料于不顾,难免离开大体,纠缠枝节,失之于隘,最终陷入凿空蹈隙的偏窘境地。只有熟悉既有史料、基本史实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才能将新史料安放于适当的位置,并据以判断研究的进展是否恰当。而没有新史料的发现,一味用后来外在的系统条理对现成史料与问题重新解释,也容易翻云覆雨,流于牵强附会。^[1]研究晚近史事,上述规则尤为重要。

治学途则,一为先因后创,一为不破不立;前者可以得道,后者易于成名,恰如武侠小说中练习正宗武功与旁门左道之别。晚近以来,学人多以打倒前人立异,然后借助根在外面的西学竖起标杆,以代际兴替之名,行派系分立之实,独树一帜、唯我独尊的大言之下,不过想争取一定的生存空间。以当下的时髦词语,便是要取得话语霸权。而群雄并起,各不相下,均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整体趋势,反而导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暴雨横潦,难得持久,易于过时。其实,国人竭平生之力以治中学,尚难识大体,游学海外,除陈寅恪等少数通学者外,大都只得一端,甚至只得一学位而已,更不用说通过交流与国际接轨而来的道听途说,或读西书摸着石头过河的个人体验。盲人摸象,不得不以偏概全,又急于贡献于国人,只好放大本位,以欺世而自炫。即使侥幸遭遇学术主流,而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维又大别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流派,定期轮回,用于欧美得其所哉,移植中土则未必适宜。费孝通教授晚年回顾其经历的三大导师,反而对史禄国赞词稍多,决非同情弱者。^[2]

就此而论,近代学人善于以革命手法争取话语霸权者,首推梁启超,20世纪初年他在思想学术各个领域吹起的一阵革命狂飙,不仅令广大青年感到振聋发聩,许多饱学之士也是耳目一新。然而,后来梁启超却深自忏悔,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语重心长的自我解剖: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

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鹵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3]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悔其少作之余,也不乏针砭时势之意。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胡适以及新文化派,在治学途径的大体方面显然步了梁的后尘。梁启超逝世后,缪凤林为文悼念,就曾直言不讳:“今日者,不学逞臆之夫,肆其簧鼓,哗众取宠,亦且因缘时会,领袖群伦焉。吾人倦怀梁氏,尤歆歆慨叹而不能自己者。”^[4]今人常常叹息学术不兴,并多方面查找原因,鄙意以为,与其说是借自外国或相关学科的框架不佳,不如反躬自省,主要问题恐怕还是出在百年以来学风流弊,治史者越来越不会研究历史。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本。

今人读史,常呈现一怪相,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而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又难免观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也就是说,今人的问题意识,往往不从材料及其所记述的历史而来,而由后出外来的理论而生。对此学人有所争议,或以为凡问题皆后出,无所谓陷阱。不过,治史先要探究问题如何从无到有,并教人如何从无到有地去看,否则,一切史事皆只有必然性的一面。果真如此,治史于人类的自我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

导致上述怪相的要因之一,是中西冲撞下的社会文化变形,以及随着社会分工日趋精细而来的学术分科的日益细化。由细分化训练出来的学人中西两面均只得一知半解,甚至一科一段的知识也难免门户之

见,更不用说望文生义的格义附会。而学人越是不识大体,越是敢于放大一孔之见,所谓盲人摸象,坐井观天。细分化所造成的学术侏儒化,导致学术领域的无序竞争,各人既然分不出高下,索性就不分高下,且自我开脱,美其名曰见仁见智。学不成则术大行其道,用种种非学术手法将有限的所知放大为整体,以误导判断力和鉴赏力不足的青年乃至资源掌握者。晚清以来的中国学术,不断趋时,又不断过时,症结之一,就在于此。

今人关于近代中国史的许多观念,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史料、史实之上,好比沙上筑塔,难得稳固。而历史教学又一味偏重于灌输知识,将教科书当作历史。实则若教以如何认识历史,则历史不仅丰富生动,而且富于智慧。否则不仅索然无味,最多谈资而已。结果后学者学得不少套话,看不懂材料本身的意思,却讲了许多“言外之意”,翻来覆去,对历史的认识根本得不到深化。尝戏言以中国学人之众,若下功夫精研各自专攻,后人与外人恐怕难有下嘴的余地。可惜学人不愿下笨功夫,甚至不知如何下功夫,底盘不稳,又好高骛远,但以轻功,如天马行空,高来高去。看似飘忽不定,实则原地踏步,进展甚微。加以学问以外的种种影响,令学人分心于术而不能倾心于学,成就难得较已有为大。或许人多畏苦,又欲名利,只好借助于术,于学反而有害无益了。由此圈内外人对于学术渐失敬畏之心,因为不知深浅,也就无所谓高低。

不知古今中外学术渊源流变的大势主体,凡事截断众流,横逸斜出,不妄者几稀。连技术层面的东西尚未掌握,就试图独辟蹊径,自习则误己,教人则害群,放言高论,更加自欺欺人。若自以为是,开卷即立意超越前人,不看前人书,或但以己意度之,以为有思想出新意,不知尚在前人笼罩之下,甚至未及前人已明之事理。所谓著述,不过将古文变成时文,以唾余为发明。自晚清学人以“中国无史论”将既有史书打入另册^[5],中国似乎只有史料,而无史书,只有官史,而无民史。在“新史学”的框架下,历朝历代之史均须重起炉灶,研究者似乎处于同一起跑线。可是,尽管新史学以不破不立将新旧学术截然分开,治学必须先因后创的规则依然制约着学术发展的进程。整体而论,接续既有传统的人文学科较移植而来的社会科学程度略高;就史学而言,国史与外国史差别甚大。至于本国史,上古部分经历清代学人由经入史的全面整理,基础较为扎实;中古部分由海内外前贤倾力相注,又得史料之多寡与立

论之难易配合适当之便,很快走上正轨,养成循正途而守轨则的专业自律,虽然这两部分也存在不断用外来框架重新条理本土材料,以及褒之则附庸蔚为大国,贬之则婢作夫人的偏弊。而晚近史一方面背负繁重的史料,另一方面其发端又主要是为了解决学术以外的社会问题,结果对于史料的重视以及运用史料的慎重,反而有所欠缺。于是只能较多地依赖于外来的解释框架,以便将有限的材料组合成条理系统,解决材料纷繁和缓不济急的难题。如此一来,所建立起来的“大体”,难免存在与史料史实不相符合的诸多问题。

要克服此类弊端,一般以为应当求助于宏观,即变换解释系统。实则凡后来与外在系统,均与当时当地不相啻,强求则势必削足适履。此虽为近代以来欧洲以外文化系统普遍面临的不得不然的尴尬,如果没有充分自觉,容易误将后来外在系统当成历史的本相,本末倒置为研究的前提。当务之急,反而是不可操之过急,只有对大量史料史实进行具体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归纳或总结出所谓一般。今人常说治史不能仅仅求真,其较高一级的目标当是寻找规律。其实二者本来统一。规律者,事物之普遍联系也。治史所凭借的天然时空联系,与逻辑联系往往一致,环环相扣,无限扩展。而且求真不仅要实事求是,更可以深入心境,探寻心路历程。求真的过程,适为不断延伸地解开个人、社会与自然连环相扣的普遍联系。在此过程中,规律将逐渐显现。

以此为准则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拓展的空间十分广阔,即使过往重点研究的部分,也大有深入的余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号称史料大发现的年代,因此前贤提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虽然就声势影响而论,甲骨、简牍与敦煌遗文最为显赫,但无论数量之多还是种类之繁,清代以来的晚近史料无疑最为巨大纷繁。除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刊印书籍之外,还有中外公私藏档、报纸杂志、函札电稿、日记年谱、家族系谱、契约文书等等,其数量远远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其中相当大量的部分属于未刊,或是根本不欲示人的秘籍;有的虽曾刊行,但流通量小;有的当年流行一时,时过境迁,已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本。目前所据条理系统,是在这些史料大都未曾寓目的情况下,利用可见片断,依据后来外在理论的逻辑系统,发挥想像,以点成面,因陋就简勾勒而成。其因应时势需要的历史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但联想与历史是否吻合,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解读。

三

近二十余年来,相关资料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出版或公布开放,可谓再一次史料大发现。而且与前此不同,除了浮出水面者外,学人还注意到水面以下巨大的冰山。例如学人素以《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和《缘督庐日记》为四大日记,以凸显其关系近代史事的重要,而近年出版的多种日记,于近代史事的重要性决不在四大日记之下,甚或在其上。据说这一时期已知未刊的日记稿本至少逾千种,其中不少以主人的地位而言,重要性亦复与上述相近。时势也为学人提供了可以从容向学的外在环境,不必仓促应急。两相配合,逐渐发现,以往所勾勒的线索脉络与历史本相之间颇有距离,有的甚至为假象所遮盖扭曲。如果充分解读史料,不为成见所囿,晚近历史的各章各节大都可以重新改写,有的恐怕将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中心的历史尤具典型意义。

康、梁一派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时期,主要是戊戌与庚子。康有为是以公羊学疑古的大家,相信史学之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自然重视历史记忆影响后世的巨大作用。梁启超则是“新史学”的倡导者,知道改变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改写历史。戊戌政变后不久,梁启超就写了《戊戌政变记》,以当事人的身份对那一段历史作了记述,成为后来学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依据。然而,梁启超的记录并非历史真实的完整影印,其中不仅因为立场利害的关系,对于诸多事实的陈述带有一面之词的偏见,而且出于后来某些政治目的的需要,有意掩饰或扭曲真相,使得历史记载适合其当下的政治需要。^[6]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曾直言不讳:“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7]

所谓感情支配,还可以说是无心之失,更为严重的是,康、梁等人常在材料上大做手脚,使得文献的主次真伪发生混乱。因此,研究戊戌维新的历史,必须综合比勘朝野上下宇内海外各派人物公私明暗的种种记录,不仅注意材料署明的时间,还须注意材料何时问世及其保存和公布的背景。近年来,随着相关资料的陆续披露,其不尽不实之处逐渐显

露,一些学人对于某些问题作了认真探究,还有许多背后的东西尚未得到澄清,需要等待更多的新材料,或是对新旧材料作进一步的梳理。历史的本相究竟如何,目前还宜粗不宜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许多方面与康、梁的描述大相径庭。

四

如果说康门师徒旨在通过重述戊戌变法的历史来突出自己,贬抑他人,对庚子勤王则刚好相反,极力掩饰其在武力行动中实际扮演过的主角作用。

庚子年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作为新旧世纪的转折,本来世纪末情节就容易引起普遍的焦虑,加上一年多前为中国带来一线生机的变法革新不幸夭折,全社会还在倒行逆施的压抑与痛苦中挣扎,新与旧的矛盾冲突使得政治天平不断向保守的一方倾斜。这一变化所引发的严重问题之一,便是中外矛盾的激化。由保守派官僚掌控权力的清政府试图利用义和团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结果导致列强联手入侵,中国陷入空前的亡国灭种民族大危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两大难题:其一,避免瓜分和奴役;其二,扭转倒退趋势,重上革新轨道。对于前者,北方的义和团只是本能地反抗,能够将中国从深渊的边缘挽救过来的希望,还须通过后一途径。就此而论,庚子年中国趋新各派在南方展开的各种救亡振兴的努力,手段虽然多样,均与这一总体目标并行不悖。迄今为止,学人对于庚子的关注仍以北方的义和团为重,而对南方趋新各派的努力,则置于次要或旁支的地位。若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南方趋新各派的勤王运动,其意义远在义和团之上。因为北方的义和团毕竟是民众自发的抗争,而南方的勤王运动则是趋新各派的自觉努力。尤其是各派联合欲在长江流域实行民主变政,更被视为立国之基。这一努力不仅吸引了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所动员的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普遍觉醒。

庚子勤王,早已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注目,发表了不少论著,也引起过一些争议。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是将两湖当作保皇会勤王的基地,而以自立军为主力正军。⁽⁸⁾造成这一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康门师徒故布迷局,有意掩饰其以两广为主要活动基地的事实,在此后

的记述中,完全回避有关的方略计划与实际作为,极力突出长江流域的自立军。保皇会当时秘而不宣,固然出于形势的需要,后来则对家乡父老不愿承担“惊粤”的罪名,对海外华侨必须展示用款的实效,对朝野官绅还要保持君子的形象。时间越久,改口越难,谎言说多了自己也信,只好弄假成真。包括革命党在内的其他派系成员,鉴于后来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不愿提及当年合作反清之事。

造成误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之下,保皇派乃至其他维新人士的历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有所涉及,也用固定的眼光对待,成见过甚。康有为、梁启超之于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大,与现有的研究状况完全不相匹配。至于众多的草堂弟子,关注研究者更加鲜少。因此对于有关人事的追寻探究,相当困难。保皇会当年隐秘的各种文献,偶尔也有传布于世,如张篁溪编《自立会始末记》下卷所收康有为致邱菽园书,以及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节录庚子前后梁启超与同门及各派同人的若干通信,但在既有的框架之下,其中许多重要信息难以充分解读。学人只能摘录一些片断,去丰富原有的认识,而难以纠正由假象所导致的变形。由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录的《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体现了学人在当时条件下的勤奋和严谨。不过,史料对于学人的认识能力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该史料集就自立会的研究而言固然大有裨益,整体上仍然只能强化原来被扭曲的印象。

五

发覆有待于新史料的问世,正是新史料的整理和编辑出版,为充分解读既有史料的完整信息,重建史实或还原历史本相,并且进一步回到历史现场,深入体察相关人事背后的复杂关系和人物的心历路程提供了契机。

有关新资料的公布,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80至90年代最为集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保皇会的文献。主要有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湾宏业书局1976年版)和《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

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和《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另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是在原来《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的基础上改订,后者虽有油印本,流传不广,运用不易。该书的优长之一,是大量选用了梁启超的往来书信。以后台湾又分别出版了《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0 辑之 97,文海出版社影印)和《梁启超知交手札》(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张子文主编,国立中央图书馆 1995 年版),大陆方面则有中华书局 1994 年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杨天石、孔祥吉、郭世佑分别披露过一些保皇会员的通信。

其二,其他维新人士和朝野官绅的文集书信日记。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郑孝胥日记》(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 1993 年版),《汪康年师友书札》(1—4 册,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1989 年版),《宋恕集》(胡珠生编,中华书局 1993 年版)。重新编辑的《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和《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虽然仍非完璧,毕竟较旧编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上海及港台出版的多种盛宣怀藏档,也保存了相关信息。

其三,海外公私藏档及相关外国人士的书信日记。庚子勤王运动是对海外华侨的一次政治总动员,保皇会设在世界各地的分会多达百余处,尤其是美洲和南洋,华侨的作用极大,保留的材料也多。方志钦主编了《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新加坡邱菽园家藏资料则由王慷鼎、汤志钧、赵令扬、张克宏等人分别披露。日本是保皇会的重要基地,不少日本人士又参与了各派维新人士的密谋。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及续编(东京原书房 1968、1973 年版),不仅提供了日本当时各种对华团体和个人的历史,而且保留了不少书信日记史料。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的《东亚同文会史》(霞山会 1989 年版),也提供了大量该会的文献。久保田文次对外务省文书的有关部分作了初步清理(《清末·民国初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革命派·变法派の活动》,昭和 63 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元年自印本),狭间直树则主持编制了《梁启超与日本关系日表(1898—1903 年)》(平成 6—7 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

果报告书,平成9年自印本)。中村义整理出版了《白岩龙平日记》,近藤邦康发表了《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杨天石和廖梅则利用或发表了《井手三郎日记》以及宗方小太郎、柏原文太郎、犬养毅等人的文书。^[9]

新史料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历史拼图的缺失,刷新或恢复了历史图像,而且造成进一步解读旧史料的契机。治上古史所谓识一字成活一片,在晚近史的研究中只要肯用心苦读,当时有所悟。只是史料愈近愈繁,搜罗不易完全,熟记更加困难,或然性又大为增多。如果不能将各类新旧史料融会贯通,则无法将史料安置于适当位置,难免偏于一端,放大或缩小其于认识史实的价值。

六

随着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蒙在庚子勤王之上的幻影逐渐褪去,历史的本相渐渐显露。

对于庚子勤王运动的重新认识,大致循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对自立会的历史进一步深究。胡珠生在编辑《宋恕集》的基础上,参照《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撰写了《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强调江浙派士绅在正气会到自立会发展脉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可对长江流域的联合大举局面重新认识。二是发现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在两广而非两湖。1982年出版的《康有为与保皇会》,选录康氏家属后人捐赠的康有为遗稿和保皇会员的来往函札,其中关于庚子勤王运动的数量较多。这些未经改纂的原始文献,为了解保皇会的勤王方略和实际运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但由于解读困难,以及原有认识的偏差作祟,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运用。直到90年代,才逐渐为学界所重视和破解。林克光在所撰《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对保皇会两广兴师的战略有概括性描述;汤志钧《孙中山和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两文,也提及保皇会在两广的布置;稍后,陈长年和我分别撰文详论保皇会庚子勤王的谋略与运作(陈长年:《康梁在两广的勤王活动》,《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桑兵:《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历史研究》1993年第1

期),至此,与保皇会相关的庚子勤王史的轮廓大体显现。

在此前后,海内外一些学人如汤志钧、王慷鼎、赵令扬、杨天石、孔祥吉、黄宇和、中村哲夫、藤谷浩悦以及稍后容应萸、邱捷、郭世佑、廖梅、李永胜等,不断发掘各种散见的史料,以求更多地将有史料所蕴含的信息解出,从不同方面对于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程度不同地有所贡献。拙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一书,前4章《兴汉会的前因后果》、《保皇会庚子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勤王运动中各政治团体的关系》、《保皇会的暗杀活动》,在解读新旧史料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角度试图重建庚子勤王运动的史实。另有一些相关研究的进展,对某些具体细节的认识提供了帮助,如叶钟铃的《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邱新民的《邱菽园生平》(胜友书局,1993)、陈善伟的《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既有著作,不仅有助于新史料的解读,本身也显现出新的含义,如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这使得因资料不足以及保皇会故布迷局而形成的有关勤王运动的诸多假象相继被勘破,真相逐渐显现,原来争议较多的保皇会与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也日渐清晰。

不过,相关史料的确难读,虽经海内外众多学人的持续努力,还是有部分内容未能完全读懂,已经解读的部分间或有误。随着新史料的陆续披露,不断与既有史料比勘对读,时有心得收获,又相继撰写了10篇论文,并不断依据学界同好的研究和自己进一步研读史料,随时修订旧稿。自觉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已尽可能地加以解读连贯,至于未能读出的部分,则信守阙疑,留有以待。

就目前情形而论,仍有两方面遗憾:其一,关于保皇会海外活动的资料。保皇会成立于海外,分会组织遍布世界各地,参与者大都是华人华侨,勤王运动的主要财政支持也来自华侨的捐款。在美洲、南洋、日本及港澳,保皇会和华侨创办了数十种报刊,除少数几种流传较广或已影印重版之外,多数难得一见庐山真面。参与保皇会的华侨后人及其团体,可能还保存有不少文献,目前见到的只有谭良和邱菽园的藏件。有此缺憾,迄今为止,关于海外各地保皇会的组织、人事和活动,大都语焉不详。近年来,日本、澳洲、南洋部分已有学人从不同方面加以研究^[10],而更为重要的美洲部分,虽有若干论文论及其中的一些人事,整